

中国早期博物馆的收藏与活动研究 ——以亚洲文会上海博物院为例*

Collections and Public Programs of China's Early Museums:
A Study on the Shanghai Museum (R.A.S.)

刘守柔

Liu Shourou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上海, 200433)

(Department of Culture Heritage and Museolog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内容提要: 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设立的上海博物院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博物馆之一, 在中国博物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文章通过对其收藏、展示与公共活动的梳理, 尤其关注藏品中历史文物的增加、博物馆展览与公共活动的增多, 分析博物馆理念、专业人员、社会环境等各方面因素对其产生的影响。将中国早期博物馆联系起来观察, 可以看到: 对藏品的选取与阐释, 体现出的博物馆意识、文化遗产观念与社会需求; 博物馆的历史所延续的不仅是藏品实物, 还有与社会生活相结合的理念。

关键词: 博物馆 中国早期博物馆 文化遗产 上海博物院

Abstract: The previously Shanghai Museum built by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was one of the China's first modern museums. By studying its collections, exhibitions and public programs, the article shows that museum practice affected by its mission, professional staff,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useum and society. With other cases of China's museum predecessors, it focuses on the following issues: choice and interpretation of collections in museums and social context; influence of China's early museum history on social life and museum development.

Key Words: Museum; China's early museum history; cultural heritage; Shanghai Museum (R.A.S.)

19世纪下半叶由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以

下简称“亚洲文会”或“文会”)建立的亚洲文会上海博物院(以下简称上海博物院)是中国最早出

* 本文部分内容曾于2016年12月在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工作坊“东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进行报告。

现的博物馆之一，体现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影响。

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是近代英国侨民在上海设立的一处重要的文化交流机构。1872年1月，文会会所落成。1874年3月建立上海博物院，馆址设在文会二楼。1931年3月，文会会所旧建筑停止使用；10月20日，举行了新大楼奠基仪式。1933年2月，新楼于博物院路20号落成，四、五两层均为博物院之陈列室，陈列自然标本和中国历史文物，如陶瓷器、青铜器、碑刻等^[1]。文会于1952年停止运作^[2]。

一、藏品：博物馆的选择与社会的需求

1. 逐渐增加的中国历代文物收藏

上海博物院早期以自然标本收藏为主，20世纪30年代迁入新址后，不仅自然标本更为充实，中国文物的收藏也日益丰富。20世纪50年代停办后，上海市文管会接收其历史文物及艺术品6663件，其中有中国文物如古代兵器、钱币、铜器、陶瓷器、石刻像、甲骨，以及象牙、玻璃杯、烟具、玩具等^[3]。1936年出版的《中国博物馆一览》一书，记录上海博物院的藏品中已明显有历史人文的内容^[4]。

上海博物院初期的藏品组成与其得到的捐赠相关。建立之初，在华外侨运动员捐赠了上海本地的鸟类标本；1881年博物院获赠一批地质学标本，由此逐步形成了数量可观且具代表性的地质标本收藏；1884年至1887年，仍以鸟类标本收藏为大宗，且藏品数量不断增长^[5]。

收藏与展示动植物标本，是将西方的博物馆理念与模式运用到了中国，也是博物学研究的形式，如《申报》一文论及上海博物院之设立：

泰西各大城池夙有成例，凡在该地方人，必公建一院，将飞禽走兽以及各动物并列于内，以便博物者随时赏玩。如在府城，则将阖郡之物实之；如在都城，则将天下之物实之，名曰博物院。现在旅居上海之西商亦仿效泰西规模，在本埠设立一院，将中国与东洋各物齐集院中，事虽创始，而所罗列者已不少。^[6]
博物院迁入新楼后，仍持续得到当季收获的鸟

类与其他动物标本捐赠。随着规模的发展，分设自然标本与考古文物等不同部门，在年会上由各部门负责人汇报收到的藏品。博物院常年受到经费不足的压力，藏品与经费的捐赠对其非常重要。

1933年上海博物院新址开放，随之得到了大量藏品捐赠，如中外古代钱币，还有青铜器、陶器、骨器、贝壳与玻璃器等中国古代文物。开放时，考古部负责人柏达（Harold Porter）提供借展的瓷器、明器、青铜器、钱币、汉砖等考古文物，1935年也捐赠给了博物院^[7]。

2. 专业研究力量的增强与展览内容的体现

上海博物院及其部门负责人对藏品的规划起到了重要作用。如1884年博物学家史丹阳（F. W. Styan）任职管理博物院，他对中国鸟类和哺乳动物的研究颇负盛名，极大提升了博物院的鸟类标本收藏水平。1906—1921年爬虫学研究专家史竺来（Arthur Stanly）任职期间，增强了博物院在中国爬行动物标本方面的收藏，比如有针对性地征集四川、云南和南方地区的蛇类、蜥蜴等^[8]。1911年年会上他也提到自己在英国南肯辛顿博物馆（The South Kensington Museum）的经历，他在英国对其长期感兴趣的中国青铜器、绘画进行研究工作，并期待有机会在博物院展示^[9]。

1932年，博物院的管理者由荣誉监院（Honorary Curator）改为荣誉院长（Honorary Director, Director of the Museum）^[10]，由专业人士负责相应的部门：植物学、鸟类学、考古学、钱币学、鱼类学、贝壳学^[11]。1935年年会上，博物院的汇报分如下几个部分：考古学、植物学、钱币学、动物学（鸟类、鱼类、贝壳、动物、爬虫、昆虫）、博物馆商店^[12]。历史文物的收藏、管理与研究日益增强。其中，由研究中国文物与艺术品的柏达任考古学部负责人；其后，由收藏和研究中国钱币的专家裘必胜（H. E. Gibson）担任此职务（裘必胜原为负责钱币学部门）^[13]。

1923—1941年，苏柯仁（Arthur de Carle Sowerby）担任上海博物院院长。他任职期间，也是博物院新楼建设及迁入后的发展时期。苏柯仁是博物学家，善

于制作和保存标本，对中国美术和考古也有兴趣^[14]。在其创办并主编的刊物《中国科学美术杂志》（*The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后改名《中国杂志》（*The China Journal*）撰写文章，内容涉及生物、地质、园艺、旅游、美术、考古等不同领域^[15]。这一刊物与亚洲文会合作密切^[16]。同时期他所组织的“中国科学美术学会（*The China Society of Science and Arts*）”即曾有目标在上海开设科学与艺术博物馆、图书馆和美术馆^[17]。曾于1911—1912年担任文会会长的福开森（John C. Ferguson）亦于1923—1932年担任《中国科学美术杂志》编辑，并于1903—1911年担任亚洲文会会刊编辑^[18]。

文会对中国相关的研究兴趣在不断增长。约1912年时，上海博物院已可谓是中国自然历史收藏的一个中心，但也认识到自身在艺术与考古方面的不足^[19]。迁入新址开始新的发展之际，博物院期望以其具有典型意义的中国文物收藏在中国居于主导地位，满足公众长久以来的观摩学习需求^[20]。与此相应，文会图书馆也表示，他们还未收集所有与中国相关的重要的、有价值的书籍，尤其是考古与艺术领域的图书资料，仍在努力完善^[21]。

西方收藏与学术视野的拓展对文会的藏品收集与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博物院的展览也不断呈现相关的主题内容。如1936年，考古学部向苏柯仁借展汉至唐代明器38件，为马、牛、羊、猪等动物俑；裘必胜也展示了他的甲骨收藏^[22]。上海博物院两层展厅，从展厅中心到四周，约130个展柜。其中，可归入当下所理解之古代艺术博物馆或历史博物馆的展品有：中外钱币、古代兵器、古代铜器、商代石器、骨器和玉器、甲骨、石刻像、古代陶瓷等，占十六七个展柜^[23]。

1940年，文会决定与尚贤堂（*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na, Inc.*）合作，为对方存放及管理藏品和藏书，共同举办讲座等活动。展示于上海博物院的尚贤堂藏品主要为瓷器等中国文物，一套帝后画像因博物院空间有限而陈列于文会的图书馆^[24]。

儿童观众对博物院大量的自然标本饶有兴趣；

而成年观众关注点更为广泛，他们会发现博物院数量日益增长的中国历代文物，如钱币、青铜器、瓷器、陶器等，有益于其学习与研究^[25]。

上海博物院兴盛的20世纪30年代，古物陈列所和故宫博物院、历史博物馆已先后在北京成立。上海博物院与这些在现有藏品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古代艺术品汇集与展示不同，就其对于古代文物的选择而言，既有藏品征集捐赠的实际因素，也被文会的活动方向与管理研究人员的专业兴趣所引导。西方博物馆有着集合动物学、植物学、考古、艺术、人类学等藏品和标本的“综合性”传统，对上海博物院而言，将中国古代艺术与历史的内容，在“博物馆”这一西式“形式”中呈现，有着与自然科学启发社会智识同样重要的作用。如同《中国科学美术杂志》面临着“民族国家”构建与现代学术发展时期，互补结合科学领域“普世性”与美术领域“地方性”^[26]的问题，上海博物院的收藏情况也体现了这一点。

同时期，上海地方也在计划建立上海市立博物馆（*Shanghai Municipal Museum*）。这座博物馆于1933年开始计划建设，1937年落成，“上海始有国人市立之博物馆焉”，藏品主题设定为“以艺术历史为主，而历史尤须以上海为中心”^[27]。该博物馆曾获得一批何遂（Ho Sui）的捐赠及借展品，包括甲骨、玉器、秦汉铜镜、唐宋壁画、佛像、明器、古代钱币等中国古代文物7000余件^[28]。上海市立博物馆类型为“美术、历史”^[29]，展品的选择更多体现了历史文物的社会意义。“金石名贵之器物镂刻铭文，等于典谟训诂，在历史上有重大之价值”^[30]，且博物馆“不仅在保存古物文献，尤以将古代文化、近时自然物标本模型，系统的介绍于一般民众，以培养其爱护祖国文化与努力近世文明之兴趣及能力”^[31]。由此，既延续了古物研究之传统，也符合了对物质传承的期待，更在特别的历史环境下着重维护象征着历史文化的器物，体现了博物馆建设对守护本地文化传统的作用。

二、博物馆与城市文化生活的关联

1. 陈列方式带来的新体验

1875年上海博物院成立后不久,《申报》即报道其高超的标本制作技术能将动物形象生动展示于观者:“珍藏羽毛各类,西国向有妙法,虽皮已干枯,而毛可不落。现在此法,华人已得之;且又从外国购到玻璃眼睛,故无论是何异兽珍禽,一经装点,便栩栩然大有生气。”^[32]

迁入亚洲文会新大楼后,更是“悉照英美大博物馆用大玻璃柜布以天然环境”的展示方式,“使观者如身入荒山丛林之间”^[33]。院长苏柯仁还“像老画师般的为翎毛走兽‘补’景,在熊、鹿、鹤、鸟等标本的背后,不是画些山水石块树枝之类,便补点竹叶浅滩乱草等件”^[34]。展厅里排满特制的大玻璃柜,使参观者不但“看到鸟兽的形状,就是鸟兽们的生活动,也能了如指掌”^[35]。苏柯仁有信心这些陈列会非常吸引人,因为上海观众之前还未曾见到过这样的展示^[36]。

上海博物院对自然标本的陈设不仅在当时令人印象深刻,直至1956年,在震旦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院的基础上成立上海自然博物馆时^[37],依然由几代受雇于上海博物院的唐家父子制作动物标本,并在展柜里用画图表现动物的栖息生活环境^[38]。

2. 日益开放的博物馆

博物馆呈现了收藏进入公众生活以及公众参与到同一个观览空间的状态,参观者可以利用博物馆的自然标本、历史文物进行学习和研究,博物馆努力在专业群体与普通公众之间兼顾平衡。

“西人好事收集,而收集有得,又必供之同好,此博物院之所以易举也。”^[39]原本个人的收藏,转而展示于公共空间,体现了作为社会“共有”的欣赏与保存意义。亚洲文会上海博物院建立后,呈现了一种新的城市公共空间和文化活动方式,对中国自身博物馆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借鉴意义。

文会认为上海博物院应该要像欧美的那些大型博物馆一样免费开放,为公众的使用而开放^[40]。1933

年11月15日,迁入新址的上海博物院举行开幕典礼。开幕式上,福开森发言:“(博物院)是奉献于公众的”“文会有图书馆与会刊,这些属于会员们;而博物院为公众所有,文会只是其中的一部分”^[41],以此表明其作为一家致力于服务公众的机构,博物馆具有公共性。

亚洲文会新楼有演讲厅与图书馆。文会日常主要活动之一即是演讲。文会能成为上海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演讲(讲座)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42]，“成人儿童听讲者甚众,均大感兴趣,凡有志学术者,不可不往一聆也”^[43]。演讲内容亦多与博物院展示主题和藏品知识相关,如福开森《中国历代陶器述评》(1932—1933)、喜仁龙《中国人是如何欣赏画的》(1935年)、裘必胜《商代甲骨》(1936年)、明义士《商代的艺术》和《商代的宗教与文化》(1936年)、苏柯仁《中国艺术中的动物》(1936年)^[44]。西方对中国艺术品、建筑古迹等历史遗产的关注和理解,通过文会得到阐释和交流。1935年竣工的上海市立博物馆,“悉照欧美最新式之博物馆图样”,是一座外观展示中国传统艺术而有着内在现代化设施的建筑物,相应也设有演讲厅^[45]。

人们习惯博物馆这一公共空间,不仅是接受收藏品展示形式的改变,还有对于这一公共空间参观方式的适应。倘若只是从公众对这一社会新事物的接受过程来观察,博物馆考验与培养着民众的公共精神。上海博物院在20世纪20年代曾对华人参观规定如下:“只准月火二曜日下午二时至五时入览”“未满十二岁之小儿不准入内”“不得携带食物、禁止吐痰”“院品不可抚摸,损毁院品须赔偿相当价值”“值事人如以某客不宜进观,即不得擅入”^[46]。尽管参观者“反省西人鳃过虑者如是,可笑亦可羞”^[47],但规定中也包含着对于维持展厅良好参观环境的要求。

文会为公众利用的另一设施即为图书馆。传统的藏书楼以古籍保存为重,而文会阅览室向社会公众开放,体现“由私而公、由藏而开、由搁置而应用、由少数而多数”^[48]的意义。不过,文会图书

以西文为主，虽然没有限制，但主要还是供租界工部局、外国领事馆的西人借阅使用，每日到图书馆阅览的读者仅三四十人^[49]。1934年，图书馆新提供一批中文书籍，并将馆藏中文书籍分类为：名著经典、历史、哲学和文学作品集；并对一些刊物中涉及中国及周边地区的文章做了参考卡片。这些刊物如美国国家博物馆（The U.S. National Museum）的会议纪要和报告，史密森博物学院的报告和《史密森博物学院的藏品》（*Smithsonian Miscellaneous Collection*），美国东方协会（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的期刊等^[50]，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文会与这些博物馆、机构之间的联系。

与图书馆需要中文书籍的情况相似，上海博物院1933年新落成的展厅亦“各物仅有英文说明”^[51]。而到1935年，博物院诸多展品的说明牌已有了中文翻译，亦考虑出版中英双语的导览手册与图录，但因经费问题而搁置^[52]。1939年，博物院出版了中文版《上海博物院游览指南》对所有的陈列标本，均进行了详细说明，并讲述各类动物的名称、起源、形态和特点^[53]。

从1933年新址开放至1934年6月间，博物院每天上午八点或九点，到下午六点或七点免费向公众开放，包括节假日。博物院每月的参观者数量过千，其中，2/3为中国观众，且常有学童整班集体参观^[54]。1937年后，由于许多文化机构受到破坏或进行搬迁，到访文会图书馆与上海博物院的人数不断增长，文会也因此愈加重视其提供文化服务的职能。1938年11月和12月，博物院的参观人数分别达到了2623人和2171人，其中大部分是学生^[55]。1939年的观众数量超过了45000人，平均每月3755人，其中5月达到了8254人^[56]。

三、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

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世界博物馆普遍加强了社会职能，推动博物馆的专业化发展，形成社会教育机构的形象^[57]。

英法两国在中国设立博物馆之初的目的不尽相

同，但其中多少有着传递“知识与智慧”之意^[58]。20世纪上半叶，是否能有一座代表上海城市形象、适于社会生活的博物馆，已受到了关注。这其中有着欧美人士的生活习惯，他们会因为“西方的大城市有艺术博物馆、自然博物馆”而想到在上海的需求^[59]，也由于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收藏中国艺术品，学习中文和历史^[60]。

作为一家西方人在华设立的博物馆，上海博物院的基本出发点仍在于了解当地的自然资源与历史文化，1865年初的文会目标即表明“调查研究中国及周边国家相关事项”“建立图书馆和博物馆”^[61]。同时，博物院的自然标本和历史文物也成为当地民众获得科学知识的教育资源，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博物馆对学校教育起到了辅助作用，学生参观者对“有关教育之各项陈列品、尤感兴趣”^[62]。“按任何自然科学，必须学课与习验并重，方能领会真意，即不能实验者，亦须有实物示教，才能予学习者有较深之影象”，但“各校每限于环境，对于各科设备，难有较完全之购置”，上海博物院不收门票，且周日又开放，正是学校相关学科可以利用的场所。因此老师令同学前往参观学习，而同学也“多乐为之”^[63]。1931年民国教育部制定儿童节纪念办法，“当地之美术馆、博物馆等应特别为儿童开放，欢迎儿童参观”^[64]。1933年上海博物院改建更新后，市教育局提出“上海市内学校林立，教授各种科学，必须辅以实地参考”“对于该博物馆尽量利用”“如有必须参考之处，得便可前往参观”^[65]。

上海博物院的中外儿童观众数量一直在稳步增长^[66]。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博物院进行了大量面向儿童观众的教育活动。20世纪30年代，“该院于儿童节日全部开放，并延长时间，不用门票，欢迎儿童，自由入览”^[67]；提出要与上海和周边地区的学校建立紧密的联系^[68]：如1936年2月26日至5月13日，每周三下午由博物院院长进行讲座“Museum Talks”，主要以博物院的藏品为讲授基础，听众主要为大中小學生^[69]。1940年，为帮助观众理解展览内容，尤其是针对由学校老师带领的班级参观，博

博物院决定任命一名专门的教育工作人员组织活动与讲解展览^[70]。博物院还计划举办“学校儿童收藏品竞赛展览会”，“藉以鼓励及提倡学校儿童采集及收藏的兴趣”^[71]。

城市需要博物馆，博物馆也“迫切地表达自身是充满活力的城市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是市民生活的一部分”^[72]。上海博物院新址开放之时，新闻报道“上海终于能有一家永久性的博物馆”^[73]；而上海市立博物馆，则在市政规划与市民心理上，都处于中心的位置。

1936年，为呼应上海市立博物馆的建设，报刊评论：“现代博物馆，匪独能无目的搜集古董古物而已也，已成为公众福利之教育机关。其实博物馆发展之新原则，其公共收集之目的，首在教育”^[74]。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兴起的广播电台也在此时发挥了博物馆文化知识的公共传播作用。如1936年11—12月上海市广播电台有：《上海市博物馆之使命》《上海市博物馆之经过》《博物馆与工商界》《中国艺术之特色》《上海博物馆史略》等“考古艺术历史常识演讲”节目^[75]。

对西方人在华设立的博物馆，中国民众知其“非专为宣传吾国文化而设”^[76]，更希望多建立自己的博物馆。20世纪上半叶，尤其在抗战之前，中国的博物馆事业得到了较大发展。回顾中国早期博物馆的情形，尽管不同的博物馆有其各自的使命与目标，然而，博物馆教育与参与社会发展的职能，已得到一定发展。20世纪40年代初中国的博物馆学论著回顾

与展望专业发展历程，表明“博物馆最大目的，为辅助教育”^[77]；“现代博物馆者，乃教育上极重要之一机构也”^[78]。在不同时代，博物馆都选择了通过教育活动来潜移默化，发挥自身的影响力，成为城市的一处公共教育和文化交流中心。

四、小结

上海博物院曾为远东地区中国生物标本和文物收藏最丰富的博物馆之一^[79]。在其发展过程中，藏品内容的变化，城市文化机构形象的展示，既受到自身因素的影响，与文化遗产价值的认知与理解相关，也体现了这一时期的博物馆理念，回应着社会的需求。同一时期，西方博物馆设立“已有专门科学”，“陈设编目、缀补、储藏，皆本精确之方法而从事”^[80]，与中国早期博物馆之间也有着可以对应的观察。

上海博物院停办后，其藏品和图书分别归于现在的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和上海图书馆，原亚洲文会大楼也于2010年被改造为以展示当代艺术为主的外滩美术馆，博物馆建筑与藏品的历史仍在继续。2018年7月，由上海科技馆、上海博物馆与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联合举办了展览“世纪典藏——上海博物溯源”。回溯博物馆的历史，中国早期博物馆与今日的联系不仅在于藏品的承继保存，且有着博物馆理念、“艺术与科学”^[81]精神的延续。

注释

- [1] 《上海博物院讯》，《申报》1939年4月3日第十一版。文会大楼顶层设计亦可用于展览（serve on occasion as an exhibition gallery）。不过在新楼建成之时，计划作为办公场地出租，即后来为《中国杂志》和“中国科学美术学会”办公总部。The New Building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JNCBRAS), 1932(62): 3; 李天纲：《〈中国科学美术杂志〉研究（下）》，《上海文化》2015年第9期。
注：本文所引用《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均为上海图书馆整理影印本，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3年1月。
- [2] The Society ceased to function in 1952. 'About RAS', Royal Asiatic Society China in Shanghai, retrieved from <http://www.royalasiaticsociety.org.cn/about-ras/>.
- [3] 王毅：《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64—65页；《沪上三大博物馆首次联袂推出特展：从

- 世纪典藏看上海博物溯源》，上海博物馆网站，<http://www.shanghaimuseum.net/museum/frontend/articles/I00004153.html>。
- [4] 中国博物馆协会：《中国博物馆一览》，1936年，第81页。
- [5] Sowerby, Arthur de C. The History of the Shanghai Museum (R. A. S.), JNCBRAS, 1934(65): 4-5.
- [6] 致远：《上海之博物院》，《申报》1939年1月2日第十四版。
- [7]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JNCBRAS, 1935(66): 3-4.
- [8] Sowerby, Arthur de C. The History of the Shanghai Museum (R. A. S.), JNCBRAS, 1934(65): 4-6;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JNCBRAS, 1912(43): 192.
- [9]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JNCBRAS, 1911(42): 262.
- [10]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JNCBRAS, 1932(63): 10-11. 王毅：《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61页。
- [11] The History of the Shanghai Museum (R.A.S.), JNCBRAS, 1934(65): 9.
- [12]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JNCBRAS, 1935(66): 3-7.
- [13] Sowerby, Arthur de C. The History of the Shanghai Museum (R. A. S.), JNCBRAS, 1934(65): 18.
- [14] 《在博物学者的家中，鉴赏了一个上午——访问苏阿德先生印象记（上）》，《申报》1939年5月16日第十一版。
- [15] 李天纲：《〈中国科学美术杂志〉研究（上）》，《上海文化》2015年第7期。
- [16] 李天纲：《〈中国科学美术杂志〉研究（下）》，《上海文化》2015年第9期。
- [17] Sowerby, Arthur de C. A Museum for Shanghai,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January 11, 1926.
- [18] 李天纲：《〈中国科学美术杂志〉研究（上）》，《上海文化》2015年第7期；《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1910年、1911年之文会管理人员名单（List of Officers for 1910-1911, List of Officers for 1911-1912）。
- [19]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 Bronzes and Paintings, JNCBRAS, 1911, 42;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JNCBRAS, 1912(43): 192-193.
- [20]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JNCBRAS, 1934(65): 16-17.
- [21]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JNCBRAS, 1932(63): 7.
- [22]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JNCBRAS, 1936(67): 5.
- [23] 王毅：《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70、71页。
- [24]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JNCBRAS, 1941(71): 13.
- [25]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JNCBRAS, 1936(67): 4.
- [26] 李天纲：《〈中国科学美术杂志〉研究（下）》，《上海文化》2015年第9期。
- [27] 致远：《上海之博物院》，《申报》1939年1月2日第十四版。
- [28] Notes and News: Shanghai Museum, 《图书季刊》（英文本）1933年第3卷第1期。
- [29] 中国博物馆协会：《中国博物馆一览》，1936年，第74页。
- [30] 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私有重要古物之标准》，《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会议事录》，1935年，第71页。
- [31] 《豫省请设国立博物馆》，《申报》1932年11月3日第八版。
- [32] 致远：《上海之博物院》，《申报》1939年1月2日第十四版。
- [33] 《上海博物院展览珍奇动物》，《申报》1939年4月25日第九版。
- [34] 《在博物学者家中鉴赏了一个下午》（下），《申报》1939年5月18日第十一版。
- [35] 赵锦福：《上海博物院参观记》，《科学趣味》1940年第3卷第2期。
- [36]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JNCBRAS, 1932(63): 5.
- [37] 《历史溯源》，上海自然博物馆网站，<http://www.snhm.org.cn/gywm/lssy.htm>。
- [38] 江冬妮、沈宁：《回忆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初创——陈赛英女士访谈录》，《中国科技史杂志》2010年第1期。
- [39] 首律：《上海英国博物院概况》，《广益杂志》1922年第34期。
- [40] Sowerby, Arthur de C. Royal Asiatic Society Aims and Administration,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November 24, 1932.
- [41] Ferguson, J. C. The Reopening of the Shanghai Museum (R. A. S.), JNCBRAS, 1934(65): 1.
- [42]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JNCBRAS, 1934(65): 12.
- [43] 《亚洲文会今日演讲》，《申报》1936年3月31日第十二版。

- [44] 王毅:《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201—203页。
- [45] Great Shanghai: The Municipal Museum,《大上海工商汇刊》,1935年6月。
- [46] 首律:《上海英国博物院概况》,《广益杂志》1922年第34期。
- [47] 首律:《上海英国博物院概况》,《广益杂志》1922年第34期。
- [48] 陈友松:《图书的改革》,《申报》1927年2月11日第二十三版。
- [49] 李建中:《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图书馆杂志》1983年第3期。
- [50]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JNCBRAS, 1934(65): 14.
- [51] 《亚洲文会内上海博物院今晨开幕 陈列各种标本收集颇富》,《申报》1933年11月15日第十二版。
- [52]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JNCBRAS, 1935(66): 3.
- [53] 《上海博物院讯》,《申报》1939年5月28日第十二版。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JNCBRAS, 1940(70): 5-6.
- [54]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JNCBRAS, 1934(65): 18.
- [55]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JNCBRAS, 1939(69): 10.
- [56]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JNCBRAS, 1940(70): 5.
- [57] 杨玲、潘守永:《当代西方博物馆发展态势研究》,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10页。
- [58] Claypool, L. Zhangjian and China's First Museum,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4, 2005(3): 570-575.
- [59]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Plans Shanghai Museum, The China Press, March 26, 1912.
- [60] Sowerby, Arthur de C. The Shanghai Mind,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October 21, 1927.
- [61] Report of the Counci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JNCBRAS, 1864(1): 7.
- [62] 《亚洲文会上海支会 阐扬中国文化》,《申报》1938年12月1日第十版。
- [63] 高纯甫:《亚洲文会博物院脊椎动物标本纪略》,《华东联中期刊》1940年第1期。
- [64] 《儿童节纪念办法》,《申报》1931年8月19日第十二版。
- [65] 《市教局令各校参观亚洲文会博物馆》,《申报》1933年11月29日第十四版。
- [66]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JNCBRAS, 1936(67): 4.
- [67] 致远:《上海博物院讯》,《申报》1939年4月3日第十一版。
- [68] Ferguson, J. C. The Reopening of the Shanghai Museum (R. A. S.), JNCBRAS, 1934(65): 2.
- [69]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JNCBRAS, 1936(67): 4.
- [70]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JNCBRAS, 1941(71): 13.
- [71] 赵锦福:《上海博物院参观记》,《科学趣味》1940年第3卷第2期。
- [72] 徐坚:《名山:作为思想史的早期中国博物馆史》,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86—188页。
- [73]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April 10, 1934.
- [74] 《外报论上海市博物馆 颇多勤勉之词》,《申报》1936年2月21日第十一版。
- [75] 《申报》1936年11月20日、11月27日、12月4日、12月11日、12月18日、12月25日。
- [76] 《中华博物院组织缘起》,《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17册第三辑(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85页。
- [77] 曾昭燏、李济:《博物馆》,正中书局,1947年,第63页。
- [78] 韩寿萱:《中国博物馆的展望》,《教育杂志》1947年第32卷第6期。
- [79] 王毅:《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25页。
- [80] 《刘海粟归国后报告教育部书(五)》,《申报》1931年10月23日第八版。
- [81] 《探索都会里的博物精神:首届“艺术与科学”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博物馆举行》,上海博物馆网站, <http://www.shanghaimuseum.net/museum/frontend/articles/I00004154>。